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十八編 第二十冊

戰國竹書研究方法探析

牛新房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八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20冊

戰國竹書研究方法探析

牛新房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國竹書研究方法探析／牛新房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序 4+ 目 2+20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八編：第 20 冊)

ISBN：978-986-322-628-4 (精裝)

1. 簡牘學 2. 研究考訂

011.08

103001313

ISBN-978-986-322-628-4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八編 第二十冊

ISBN：978-986-322-628-4

戰國竹書研究方法探析

作 者 牛新房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十八編 22 冊 (精裝) 新台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戰國竹書研究方法探析

牛新房 著

作者簡介

牛新房，1981生，河南省衛輝市人，歷史學博士，現任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出土文獻與古文字、先秦史。在《古文字研究》、《中國歷史文物》、《中國文字學報》、《中國文字研究》等刊物發表研究論文十餘篇。

提 要

本書把戰國竹書從出土戰國文獻資料中分離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探討其研究方法，為以後的研究提供借鑒。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緒論，首先是對戰國竹書的界定；其次是有關戰國竹書發現的簡介，包括歷史上發現的戰國竹書和現代發現的戰國竹書，本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郭店、上博、清華三批竹書；最後是對近年來戰國竹書研究情況的概述。

第二部分是本書的主體，分為三章，分別從竹書復原、文字考釋、文獻比勘三個方面探討戰國竹書的研究方法。竹書復原一章，首先探討竹簡形制與竹書復原的關係，其次探討竹書復原的過程與方法及應注意的問題；文字考釋一章，首先探討戰國竹書文字的考釋方法及應注意的問題，其次探討利用戰國竹書文字的考釋成果研究其他古文字的問題；文獻比勘一章，首先探討戰國竹書和傳世典籍的篇章和個別詞句的對比及文獻比勘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其次探討判定戰國竹書學派屬性問題時應注意的問題。

第三部分是筆者學習研究戰國竹書過程中的一些成果，如《老子》甲篇中一個學者一般都釋為「守」的字，筆者認為應釋為「御」；對《成之聞之》篇「受次」及相關文字的釋讀；對《容成氏》篇的編聯、篇題、學派歸屬等的探討。

序

白於藍

1998年，郭店楚墓竹簡公佈，在古文字學界引起了極大震動，戰國竹書開始成爲古文字學領域的研究熱點，同時也引起了歷史文獻學、學術思想史等相關領域學者的關注，而隨後公佈的上博簡和清華簡，更是將戰國竹書的研究推向高潮，相關研究論著層出不窮。如今，將戰國竹書研究稱爲「顯學」是絲毫也不過分的。

在戰國竹書研究繁榮興盛的同時，也存在另一個必須得承認而且必須得面對的基本事實，即從事戰國竹書研究其實是十分辛苦的。這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就學術研究而言，任何新材料尤其是大宗材料公佈後，都需要一個相對長期的吸收和消化的過程，需要學術周期的循環積累與自我反省。但是，在郭店簡公佈之後不久，上博簡就開始以每年一冊的速度陸續公佈。2010年以來，清華簡亦開始逐年公佈。到今天，上博簡已經出版到第九冊，清華簡也已經出版到了第三冊。新材料如此密集地公佈，給相關領域學術研究提供了便利，帶動了學術繁榮，但也同時帶來了貪多嚼不爛、消化不良的弊端。其次，近幾年隨著網絡的進步和發展，與戰國竹書研究有關的「簡帛研究」、「簡帛」等諸多網站亦應運而生，這些網站對相關研究成果的及時發佈無疑提供了便利，對推動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的是各類研究成果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現象比較嚴重，大量有欠思考的低端產品甚至贗品充斥網絡，給學術成果的甄別和吸收工作增添了難度，同時也增加了龐大的閱讀量，給研究工作帶來了實質性困擾。以上是戰國竹書研究領域所存在的基本事實，學界在深切感受學術繁榮的同時，亦深切感受到了新材料大量湧現所帶來的苦

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能夠對自郭店簡公佈以來的十餘年間有關戰國竹書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總結，對那些成功的、半成功的以及失敗的經驗加以探討，為今後的研究提供借鑒，無疑將會是一件嘉惠學林的有益之舉，對今後戰國竹書的研究亦將具有指導意義。

2007年，牛新房博士入學不久，就告訴我想就戰國竹書研究的方法論方面做些研究，覺得有必要從案例分析入手，對學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得失加以探討，並對其原因加以分析，為以後研究提供參考借鑒。毋庸諱言，對於一個剛剛入門不久的初學者來講，擬定這樣一個研究方向顯然是很有難度的，而且類似這樣的工作似乎也不應該由一個剛剛入學不久的博士生來做。但他很有毅力，認認真真堅持做了下來，在原始文本的整理以及相關研究成果的甄別與吸收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原論文從竹書復原、文字考釋和文獻比勘三個方面對戰國竹書的研究方法都進行了深入探討，基本涵蓋了戰國竹書研究的各個領域，並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個人見解。論文答辯時獲得了評審專家和答辯委員會的一致好評。

需要說明的是，在他博士論文寫作進行到最關鍵的時候，還重病纏身，深受病痛的困擾，需要長期打針吃藥，費用十分昂貴，他還需要經常外出代課，補貼家用。內中甘苦，我想他人是難以體會的。

博士畢業後，牛新房繼續留在了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任教。在承擔本科與碩士的繁重教學任務之餘，他又對原論文做了不少增補修訂，不僅增補了大量的案例分析，同時也增添和完善了很多個人研究心得。另外，從材料來源上來看，原論文僅限於《郭店楚墓竹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七）兩種。本次修訂，又增加了後來相繼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九）以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三）的內容，並同時增補了對相關研究成果的探討，內容也更加充實厚重。

古文字學向來以難學著稱。我常常想，對於學習古文字的初學者來講，大體需要在以下六個方面下些功夫：第一是古文字學的基本理論，第二是古文字原始材料和字形分析，第三是前人相關研究成果，第四是上古音和訓詁學基本知識，第五是傳世文獻，第六是考古學尤其是器形學知識。以上知識需要長期積澱，並且需要逐步融會貫通。一路走來，我想牛新房對此也是深有體會和感觸的吧。

如今三年過去了，看到這部即將付梓的書稿，我的內心也充滿了喜悅。

在此，衷心祝願牛新房能夠永葆青春活力，在學術道路上繼續發揚拼搏精神，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2013年8月



目次

序 白於藍	
緒論	1
一、戰國竹書的界定	1
二、戰國竹書的發現	4
三、本書所涉及的戰國竹書簡介	10
四、近年來戰國竹書研究概況	19
五、本課題的研究價值及本書的主要內容	26
第一章 竹書復原	29
第一節 竹簡形制	30
一、簡長	30
二、簡端	34
三、契口	36
第二節 竹書復原	39
一、拼合、遙綴	39
二、編聯、編聯組	48
三、篇際調整	51
第三節 應注意的問題	56
一、篇題位置	56
二、字體及書寫格式	60
三、簡背內容	64
第二章 文字考釋	73
第一節 考釋方法	75
一、字形分析	75
二、字音推考	78
三、字義比勘	86
四、文獻對校	93
五、應注意的問題	96
第二節 特殊字的處理	98
一、殘字	98
二、合文、重文	101
三、錯別字	104
四、脫字、衍字	106
第三節 拓展研究	108

一、考釋甲骨文	109
二、考釋金文	111
三、考釋其他類型的戰國文字	115
四、校補《說文》	121
五、校讀古書	125
第三章 文獻比勘	131
第一節 與傳世典籍的篇章及詞句對比	133
一、對傳世文本的校正——以《緇衣》爲例	133
二、對傳世文本的新認識——以《老子》爲例	138
三、與傳世典籍的詞句對比	143
第二節 應注意的問題	145
一、趨同與立異	145
二、「閱讀習慣」	146
三、年代	148
第三節 判定戰國竹書的學派屬性及應注意的問題	150
第四章 研究舉例	157
第一節 郭店竹書研究	157
一、釋《老子》甲篇中的「御」字	157
二、說《成之聞之》中的「受次」及相關問題	162
第二節 上博竹書研究	167
一、讀上博竹書札記	167
二、竹書《容成氏》補議	173
參考文獻	187
後記	201

緒論

一、戰國竹書的界定

早在 20 世紀 20 年代王國維就曾指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待今日始矣。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見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經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見之金石書籍，於學術有大關係者，尚不與焉。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也。」

〔註 1〕王國維所提到的幾項發現都已成了專門之學，在其去世之後出土的大量戰國文字資料（特別是簡帛資料）與上述幾項發現相比毫不遜色，近幾十年來，戰國文字研究的興起便是證明。清代小學的發展為 20 世紀出土文獻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現代考古學的建立與發展，使出土文獻有了可靠的依據。1949 年後，隨著國家建設的發展，有組織的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戰國秦漢時期的資料，而其中簡帛資料尤為突出，為研究這段時期的歷史、思想、文化等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出土文獻在傳統文史研究中的作用越來越引起學者的重視。

〔註 1〕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新發現之學問》，《王國維文集》第四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 年版，33 頁。

戰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革時期，〔註2〕王室衰微，七雄爭霸，各國爲了壯大國力，變法圖強，先進生產技術的應用，使社會生產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同時，在思想領域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繁盛局面。反映在語言文字上，則是各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許慎《說文解字·敘》），王國維最早指出戰國時期秦用「籀文」，東方六國用「古文」。〔註3〕隨著出土戰國文獻資料的豐富和研究的深入，我們知道東方六國的「古文」也各有不同，李學勤先生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了戰國文字分系說，即東方的三晉、齊、楚、燕、兩周，再加上西方的秦。〔註4〕隨後，學者在此基礎上將戰國文字分爲五系，即齊、燕、三晉、楚、秦，〔註5〕這一分法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同。

出土的戰國文字資料按其載體來分，主要有銅器、石器、貨幣、璽印、陶器、簡牘、漆器、縑帛等種類。而簡牘類資料因其材料的便宜性，是戰國文字資料的最主要的載體，其所記載的文字數量也是最多的。按其所記內容來看，大致可分爲文書和書籍兩個大類，而每個大類又可以再分爲兩個小類，文書類可分爲喪葬文書（如遺策，告地策等）和文書檔案（如書信，簿籍等）兩種，書籍類可分爲實用書籍（如日書，法典等）和圖書典籍（如《老子》、《緇衣》等）兩種。〔註6〕這是按大類來分的分類方法。還有學者分得更詳細，認爲可以分爲十類：1、編年；2、文書；3、田律；4、日書；5、地圖；6、書信；7、卜筮；8、遺策；9、典籍；10、小說等。〔註7〕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學者根據自己研究的需要，往往有自己的分類標準與方法，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標準與分類。本書研究的對象即指前述兩種分類方法中的「圖書典籍」

〔註2〕「戰國」作爲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其起訖年份史學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從文獻研究的角度來看，由於思想、文字等有其自身發展演變的規律，並不能用具體的歷史年份做分界。董珊先生在其博士學位論文《戰國題銘與工官制度》（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李零教授，2002年）中從時間和空間兩方面對「戰國」這一概念做了界定，可參看。從戰國出土文獻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一界定是合適的，故本書在下面的行文中遵從這一界定。

〔註3〕王國維：《戰國時期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觀堂集林（外二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86~187頁。

〔註4〕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文物》1957年第7、8、9期，後收入《李學勤早期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註5〕參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章「戰國文字的發現與研究」中的相關論述。

〔註6〕鳳儀誠：《古代簡牘形式的演變——從葬物疏說起》，「2008年國際簡帛論壇」論文。

〔註7〕參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25~32頁。

或「典籍」。如果要下一個定義的話，本書所說的戰國竹書是指戰國時期書寫在竹簡上的典籍。戰國竹書在歷史上雖時有發現，但除了當時學者的整理本，沒有實物留傳下來，難以成爲我們從整體上探討戰國竹書研究方法的對象，故本書所研究的對象主要是近年出土的、現在能見到實物的戰國竹書。

由於地理氣候等原因，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戰國竹書實物多是楚國境內出土的，因此學界在稱呼這些資料時，或稱爲楚簡，如《郭店楚墓竹簡》，或稱爲楚竹書，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或稱爲戰國竹簡，如《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隨著研究的深入和細化，這樣的稱呼有很多不便，如包山楚墓出土的楚簡多爲文書、卜筮、遺策之類，而沒有典籍類的文獻，這樣如果我們像學界常用的稱呼那樣，把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簡稱爲「郭店楚墓竹簡（或郭店楚簡）」，把包山楚墓出土的竹簡稱爲「包山楚墓竹簡（或包山楚簡）」，就不能看出二者的在具體內容上的差別。稱爲「楚竹書」雖然比籠統地稱「楚墓竹簡（或楚簡）」合理一些，可以看出竹簡的內容是書籍類的，但也有一些問題。「楚竹書」是以其出土地加竹簡內容的性質來命名的，我們知道，雖然大部分楚地出土的竹書是以典型的楚文字書寫的，但其中也常含有其他系的文字因素，反映了戰國時期各國思想文化的交流。所以很多學者對「楚竹書」的說法也提出了疑問，這方面研究最深入的是馮勝君先生。馮先生根據裘錫圭和李家浩兩位先生的研究，指出雖然「楚地出土的戰國簡都是楚人的抄本」，但某些篇章「與典型楚文字相比，在文字形體和用字習慣方面都存在大量顯著差異」，所以他提出「在目前的情況下對這類包含較多他系文字因素的竹書，比較穩妥的界定似應爲『具有某系文字特點的抄本』。『具有某系文字特點』是指簡文中包含有較多的該系文字因素，類似《五行》篇那種包含零星的非楚文字因素的簡文不在此列。『抄本』一詞則涵蓋了兩種情況：一種是某系書手的抄本，一種是楚人以某系書手的抄本爲底本的轉錄本。在楚人的轉錄本中可以包含一些楚文字的因素，這應該不會影響對『具有某系文字特點』的界定。正如《五行》篇包含零星他系文字因素，但我們仍然可以認爲它『具有楚系文字特點』一樣。」〔註8〕用這類稱法來界定某些具體篇章確實是比較合適的，並且也爲研究戰國文字各系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可靠的基礎，

〔註8〕馮勝君：《有關戰國竹簡國別問題的一些前提性討論》，《古文字研究》第26輯，中華書局，2006年版，318頁。更詳細的研究可以參看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線裝書局，2008年版）中的相關論述。

但是如果我們把戰國書籍類竹簡當做一個整體來研究的話，這樣的稱法就顯得有些繁瑣。〔註9〕稱為「戰國竹簡」與籠統地稱「楚墓竹簡（或楚簡）」，存在同樣的問題。結合以上論述，我們認為把這些典籍類的竹簡稱為戰國竹書是比較穩妥的稱法，這樣可以避免上述幾種稱法的不便與異議。若為了表明不同批次的竹書，則可以稱郭店竹書、上博竹書、清華竹書等。需要說明的是，因目前學界對之還沒有統一的認識，學者在論述過程中仍用「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等說法，在下面的行文中引到各家論著時，為保持原貌對此類說法不做改動。

二、戰國竹書的發現

戰國竹書或隨主人埋入地下，或因避秦火而被隱藏，在後世時有發現。歷史上著名的發現主要有兩次，分別為孔子壁中書和汲冢竹書。由於材料自身的特性，歷史上發現的戰國竹書實物都未能保存下來，我們只能從相關的記載及流傳至今的當時學者的整理本略見其貌。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二十世紀後半期以來發現的戰國竹書實物都得以保存，為我們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方便。下面就這些歷史上發現的比較重要的戰國竹書和現在發現的戰國竹書，按發現時間為序作一簡單介紹。

（一）歷史上發現的戰國竹書〔註10〕

1、孔子壁中書

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家著書立說，至秦滅六國，怒儒生以言干政，聽信李斯等讒言，「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

〔註9〕從下文將要提到的歷史上發現的戰國竹書來看，其他各國也確有竹書出土，並且我們相信隨著考古的發展，將來也應該能見到其他各國竹書的出土。因本書是將戰國竹書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所以我們不用「具有某系文字特點的抄本」的說法。

〔註10〕李零先生在《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2004年版）一書第三講「簡帛的埋藏與發現」中有相關的論述，楊澤生先生在《戰國竹書研究》的緒論「古代出土發現的戰國竹書」（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中也有專門的論述，而對歷史上發現的簡帛資料最系統全面的統計是呂靜、鄭卉兩位先生的《1900年以前中國境內出土簡帛之考察——以傳世文獻收集整理為中心》（日本中國出土資料學會編《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13號，2009年，62~83頁）一文，作者還對歷史上發現的簡帛資料的出土地域、所記內容、出土形態及整理和散佚情況做了很好的論述，我們的敘述多有參考以上三家之文者。

開獻書之路」，於是有濟南伏生之獻書等。又「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漢書·藝文志》）。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孔子壁中書」。這批竹書曾經孔子後人孔安國整理，竹書原是用「古文」書寫，孔安國以「今文」書之，是為「隸古定」，這種整理方法為後世所沿用，直到今天我們整理出土文獻仍用此法。孔安國把他整理的成果獻於朝廷，但「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等到劉向校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時，「《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漢書·藝文志》）。可知這批書確是寫在竹簡上，每簡 22 字或 25 字不等。如前引王國維所言，「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其影響不可謂不大。關於其書寫文字，或稱「古文」、「古字」，或稱「科斗文字」、「科斗書」，這些文字部分被收入《說文》中，成為我們今天研究戰國文字的重要參考。近年楊澤生先生根據王國維、李家浩等學者的研究，指出「孔壁竹書為戰國時代齊系的魯國文字」，〔註 11〕這一說法應該是可信的。

2、汲塚竹書

這批竹書，是西晉初年在汲縣一座戰國時魏國墓葬裏發現的，《晉書》等有記載，但其具體出土年代同一書所記卻各有不同，如《武帝紀》：「咸寧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秘府。」《律曆志》：「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另外還有太康八年說。陳夢家認為「太康八年說」決不可信，又疑「咸寧五年十月」為「太康元年十月」之誤，「元年十月出土，而官收車送當在次年，故諸書均謂二年出土也」，〔註 12〕可備一說。出土地點是汲郡的汲縣，戰國時屬魏。其所出土的墓葬，有「古冢」、「魏襄王冢」、「安釐王冢」等說法，陳夢家認為「魏自惠王至魏亡都大梁，帝王冢不得在汲」，當是「魏國大臣之墓」。〔註 13〕據荀勗《穆天子傳序》「皆竹簡素絲編……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其字體應是三晉系。竹簡獻上朝廷，有學者束

〔註 11〕 楊澤生：《戰國竹書研究》，184 頁。

〔註 12〕 陳夢家：《汲塚竹書考》，《尚書通論（外二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598 頁。

〔註 13〕 陳夢家：《汲塚竹書考》，599 頁。

皙、荀勗、和嶠等多人受命整理，共有書十九種，七十五篇。其內容為史類、地理類、卜筮類、小說類、雜類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書《紀年》十三篇和《穆天子傳》。這些整理本在後代多有亡佚，學者有輯本。學者利用這些文獻研究先秦史取得了重要成果，近年對此批竹書研究取得成果較多的是夏含夷先生。〔註14〕

3、其他竹書

如前面提到的濟南伏生所獻的《尚書》；河間獻王所得到的先秦古書《周官》、《尚書》、《禮記》、《老子》等；孝宣帝時，河內女子拆除老屋時得到的《易》、《禮》、《尚書》等；另外還有北齊武平五年彭城人掘項羽妾墓，得到的古文《孝經》等。

（二）現代發現的戰國竹書

1、長臺關竹書

1957年河南省信陽長臺關一號楚墓發現兩組戰國時期竹簡，第一組為竹書，第二組為遺冊。第一組竹書簡，共計119支，全部為殘簡，殘存500餘字。殘簡長短不齊，殘存最長者約33釐米，據編痕推算，估計原簡長45釐米左右，每簡約30字。〔註15〕這批竹書先後收入《河南信陽楚墓出土文物圖錄》〔註16〕、《信陽楚墓》〔註17〕、《戰國楚竹簡彙編》〔註18〕，後兩種有釋文和考釋。對這批竹書做最早研究的是李學勤先生，他根據文中有「先王」、「周公」、「君子」、「三代」等，認為是「一篇屬於儒家的論述政治道德的文章」，並指出「這是我國近代以來第一次發現真正的戰國竹書」。〔註19〕後又認為是

〔註14〕夏含夷先生的研究成果頗豐，如《也談武王的卒年——兼論〈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竹書紀年〉與周武王克商的年代》、《〈竹書紀年〉的整理和整理本——兼論汲冢竹書的不同整理本》、《晉出公奔卒考——兼論〈竹書紀年〉的兩個纂本》等，以上文章都已收入其著《古史異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可參看。

〔註15〕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一隊：《我國考古史上的空前發現：信陽長臺關發掘一作戰國墓》，《文物參考數據》1957年第9期，21~26頁。

〔註1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信陽楚墓出土文物圖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註1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註18〕商承祚編著：《戰國楚竹簡彙編》，齊魯書社，1995年版。

〔註19〕李學勤：《信陽楚墓中發現最早的戰國竹書》，《光明日報》1957年11月27日第3版，後收入《李學勤早期文集》，69~70頁。

《墨子》佚篇。〔註 20〕李零先生認為是周公與申徒狄的對話，篇題定為《申徒狄》更合適。〔註 21〕楊澤生先生也對之作了深入的研究，認為其屬於儒家。〔註 22〕關於長臺關竹書的研究情況，可參看田河先生的《信陽長臺關出土竹書研究概述》。〔註 23〕

2、慈利竹書

1987年，湖南省慈利縣城關石板村36號戰國墓出土了一批竹簡，斷裂錯位現象十分嚴重，無一完簡，共有殘簡4371段。殘存最長者36釐米，短者不足1釐米，估計整簡長45釐米，數量約1000支，字數共約21000多。後經統計，簡頭817個，簡頭簡尾難於分辨者27個。據同出器物的特徵，墓葬年代為戰國中期前段。〔註 24〕據張春龍先生介紹這批竹簡主要內容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有傳世文獻典籍可資對勘的，如《國語·吳語》、《逸周書·大武》等，另一類是《管子》、《寧越子》等書的佚文或古佚書。少部分簡簡背標有數字。《吳語》簡長46釐米，寬1釐米左右，三道編繩，每簡約書寫50字。除了發掘簡報公佈的零星圖片，整體資料尚未公佈。

3、郭店竹書

1993年8月，位於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的郭店一號墓被盜掘，10月再次遭到盜掘，荊門市博物館在報請有關部門同意之後，對其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據發掘報告，郭店一號墓從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徵看，具有戰國中期偏晚的特點，下葬年代當在公元前4世紀中期至3世紀初。除出土了大量銅器、陶器、漆木器等外，最引人注意的是出土了800餘支竹簡，共約一萬三千餘字，其內容有《老子》甲、乙、丙三組及《太一生水》、《緇衣》、《五行》、《成之聞

〔註 20〕李學勤：《長臺關竹簡中的〈墨子〉佚篇》，《徐中舒先生九十壽辰紀念文集》，巴蜀書社，1990年版，1~8頁，後收入《簡帛佚籍與學術史》，327~333頁。

〔註 21〕李零：《長臺關楚簡〈申徒狄〉研究》，《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309~328頁。

〔註 22〕楊澤生：《長臺關竹書研究（四篇）》，《戰國竹書研究》，36~57頁。

〔註 23〕田河：《信陽長臺關出土竹書研究概述》，《長春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4期，2005年7月。

〔註 2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縣文物保護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10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縣文物保護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縣石板村戰國墓》，《考古學報》1995年第2期；張春龍：《慈利楚簡概述》，《新出簡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4~11頁。